

花华圣经书房与晚清西学翻译

——兼论宁波作为美国传教士传播西学之摇篮在晚清译史中的地位

高黎平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系, 福建 宁德 352100)

【摘要】花华圣经书房系19世纪中叶来华美国传教士在华设立的第一个翻译出版机构,为外来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在华进行西学翻译传播活动提供了地利人和的用武之地,它经过数十年的迁徙演变,发展成为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翻译出版机构,在晚清翻译史上不但有开来华美国传教士编译出版书籍之先河的作用,而且是晚清译坛一支不可小视的长盛不衰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花华圣经书房;在华美国传教士;晚清;西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G239.22;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35(2007)04-0055-05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 & Transla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 On position of Ningbo, a cradle where American missionaries spread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ao Lipi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Ningde Teachers College, Ningde 352100,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 is the first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It provides foreign missionaries, specially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conducting transla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with a unique talent-showing place. After several decades' evolution, it becomes quite influential in China in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not only playing the introducing role of translation by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but also being a powerful and active team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在中国历史上,宁波“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教会”的所在地,是“美国长老会在华传教的总堂”。^{[1]306}那么,宁波是否也是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西学的主战场呢?我们知道,研究晚清中国翻译史,不能不提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翻译界独树一帜的西学翻译;探讨美国来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不能不涉及他们在华创办的翻译

出版机构;细说美国传教士在华设立的翻译出版机构,更是不能不将这段别具风格的历史追溯到美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就在澳门创立的“花华圣经书房”,因为该书房虽然诞生在大陆之外的弹丸之地澳门,可不久之后却迁移到东部沿海开埠后西学传播地缘条件优越的宁波,最后落户于中国近代西学翻译传播中心的上海。

花华圣经书房在中国晚清翻译史上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它是为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大张旗

收稿日期:2007-06-12

鼓从事西学翻译而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它编译出版过为数甚多、意味悠长的西学译著；它所编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客观上在晚清西学翻译荒芜的年代显现出相当普遍的启蒙意义。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花华圣经书房这段色彩鲜明的翻译活动鲜为翻译史学者所关注，在中国翻译史专著中也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笔者拟将从花华圣经书房蜿蜒曲折的历史变迁中，深层次地探求美国来华传教士编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对中国晚清翻译发展的贡献及其意义。

一、花华圣经书房的迁徙与演变

晚清时代，为了适应西学在中国广为传播的迫切需要，花华圣经书房经历了从海外澳门到大陆宁波再到上海三易其地的变迁过程，每次迁移无不发生书房规模从小到大、翻译力量从弱到强、译书数量从少到多、社会影响从浅至深的质变。

花华圣经书房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原设在澳门的印刷所。该印刷所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2月23日始创于澳门，负责人为美国长老会在华传教士柯理（Richard Cole，又名谷玄或科尔），柯理虽系英国传教士，却为美国在华教会组织工作。在澳门印刷所创办之前，那儿的印刷条件相当简陋。虽然西洋活字印刷在明朝万历年间由天主教会传至澳门，可当时只能是油印西文。1815年，英籍传教士马士曼委托P.托马斯在澳门刻制字模，运至星洲（今新加坡）用于印刷中文《圣经》。19世纪初叶，赖格兰德在香港首先刻成汉字字模后，美国长老会订购了一套，用于在澳门开设的印刷所。由于内在外在的种种原因，印刷所在澳门生存前后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便迁往内地发展。

印刷所从澳门迁往宁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由：一方面，随着晚清中国社会变革的加剧，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有了明确的新方向，澳门作为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播西学的前哨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退出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而不为人们所重视。另一方面，根据《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约的规定，宁波等五口岸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当时宁波为了配合西学的传播，出版事业也非常兴盛，在柯理的提议下，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7月19日，印刷所由澳门迁往宁波，易名花华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大量编译出版各种书籍杂志。该书房之所以冠以“花华”之名，是因为美国国旗为星条旗，是各国国旗中最花哨的一种，中国人常把美国称作花旗或花旗国，所谓“花华”实际上就是美华的意思。搬迁更名后的花华圣经书房的出版事务由出版委员会负责。第一届委员会由柯理、委理华、克陛存3个美国传教士组成，柯理担任主任（1845年7月至1847年8月），委员会主要负责书籍的遴选、印数和印刷范围的决定、编辑、校对、发行、书房的发展规划等。后来历任的主任有罗密士（1847年8月至1850年）、歌德（1850年至1853年12月12日）、韦理哲（1854年至1858年9月）及姜别利（1858年10月至1860年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传教士姜别利（William Gamble，爱尔兰人，早年移居美国，咸丰八年被教会派遣到宁波）于1858年抵宁波主持花华圣经书房后，就于1859年在花华圣经书房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首创制造电镀中文字模的新方法，并以此法制成1至7号美华字，俗称“宋字”，他还发明元宝式排字架浇制出铅字，尽管印刷的字迹不太清楚，但还是大大提高了铅印书籍的生产效率，为书房后来的大量编译提供了物质保证。

宁波的西学传播，因为有花华圣经书房等机构的支撑，一度颇有起色，但是由于宁波缺少强有力的政治、商业、经济、文化、人文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伊始阶段勃勃生机的美好景象日渐消逝，所以它在西学传播方面显得底气不足、日薄西山。与此同时，19世纪中叶，随着占尽地域、商业、经济、人文等优势的海中国地位节节攀升，名声鹊起，其西学传播日益呈上升之势，上海成为西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最大中心，昔日西学翻译传播一度繁荣的宁波就此被上海取而代之。于是，1860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到上海，改名为美华书馆。初迁时，馆址设在上海东门外，书馆扩大以后，设厂于四川北路横桥北，即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设发行所于北京路18号（旧门牌，今江西路口）。迁沪易名后的美华书馆由美国传教士丁勉良负责。美华书馆是近代中国翻译中心上海不可缺少的有生力量，它与在沪其他教会翻译出版机构一道在晚清几近荒芜的译坛上勤奋拓荒耕耘，撑起了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译界的一片天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翻译事业的破土萌芽以及本土翻译出版机构的纷纷涌现，像美华书馆那样一批曾经红红火火、盛极一时的西学教会翻译出版机构才渐渐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销声匿迹于兴旺昌盛的中国民族翻译大舞台。

二、美国传教士在花华圣经书房沿革中的西学翻译

花华圣经书房由美国在海外的传教组织创办，在其变迁的过程中也几乎为美国传教士主持，不言而喻，美国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起到了主导作用，所以为其编译撰稿的基本上都是美国传教士。该书房从1844年至1860年共编译出版书刊

106种，其中宗教类的有86种，天文、地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有20种。它们大多数为美国传教士所编译，其中有代表性的编译作者和著作是玛高温（Daniel Jermore MacGown, 1814—1893）的《日食图说》（1852年版）、《航海金针》（1853年版），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 1820—1900）的《平安通书》（1850年至1853年版，共4册），韦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 1819—1895）的《地球图说》（1848年版）和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 1818—1894）的《天文问答》（1849年版）等。从1844年至1859年，花华圣经书房编译出版的书籍一览表如下：^[2]

年份	1844	1845	1846	1847
册数	39500	7000	不详	52734
页数	不详	不详	635400	1819092
年份	1848	1849	1850	1851
册数	164893	75850	66400	不详
页数	3994350	1724700	300000	不详
年份	1852	1853	1854	1855
册数	不详	82000	84700	112018
页数	不详	2800000	4012800	4602018
年份	1856	1857	1858	1859
册数	不详	110800	不详	不详
页数	不详	4505600	6175460	7398560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上表中所列的花华圣经书房编译出版的大部分书籍为圣经小册子和宗教布道书籍，不过，也有一部分属于天文、地理、历史、气象、语言、风俗方面的书籍，这表明了该书房以“圣经”来冠以翻译机构名称，可并不是只以《圣经》作为惟一的翻译出版物，还是体现了一定的世俗性。

从花华圣经书房迁址上海的1860年起，更名后的美华书馆基本走出了以往以圣经为标志的宗教出版的圈子，大量翻译出版了以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著作，较为知名的美国传教士是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 1850—1924）。潘慎文1875年来华，1896到1906年任英华书院（The Anglo-

Chinese College）院长。他的译著有《格物质学》（谢洪赉笔述，是一部自然科学常识课本）、《代形合参》（谢洪赉笔述，共3卷，是一部微积分教科书）、《八线备旨》（谢洪赉笔述，共4卷，是一部三角教科书）。另外，美国传教士高第丕的夫人为美华书馆编译的《造洋饭书》（1866年版，共29页），介绍了268种西菜、西点的做法，这是晚清中国不可多得的译介西餐的书籍。下面列举几部美国传教士在花华圣经书房编译的西学代表作，并作简明扼要的分析。

《地球图说》（韦理哲，Richard Quarterman）。编译者曾一度负责花华圣经书房的工作，他还在宁波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杭州浙江大学的前身）。

《地球图说》初版于1848年,再版于1856年,并易名为《地球说略》。《地球图说》原书未见,而《地球说略》收于《小方壶輿地丛钞》第12帙,再补编,第15册,是一部简明通俗的世界地理读物,介绍了世界五大洲概况,主要收集了国家和地区的位置、人口、物产、文化、风俗、宗教等资料,其中对英、法、美等欧美列强言之不厌其详。该书图文并茂,文字通畅,有一定的可读性。该书还介绍了美国总统制:“国无王,有众统领一职,任牧民之责,其任以四年为满。至国之律法制度有各省之智能者至京城会议之,无专主之事也。统领之职,不世及,亦不拘资格,惟择有德者为之。其择也,前统领任满,每省推数人至京城,以所推选者书其姓名投于柜中,毕则启视,所推最多者为继焉。”^{[3]29}这一介绍虽然简明扼要,但对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中国人来说不啻为海外奇谈,对于正在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有识之士魏源等人,也算是一大奇闻。不过,在编译此书时,韦理哲并未忘记自己身为传教士所肩负的神圣的宣教使命,指责中国儒释道三教“皆立偶像,拜跪假神,设轮回之谬言,诱惑愚民,罪莫大焉”。^{[3]1}

《天文问答》(哈巴安德, Andrew Patton Happer)。《天文问答》的内容包括大地之形,地球图,地圆的根据,日月形态,日蚀月蚀,虹之成因,雨、雷、风等自然现象,行星、彗星、恒星、太阳引力、地球引力、万有引力等一般的科学知识。虽然书籍名为“天文问答”,但是它也包括了一些近代地理学和物理学的内容。

《平安通书》(麦嘉缔, Davie Bethume McCartee)。麦嘉缔,字培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医学博士。他于1844年来华,在宁波传教期间从1850年到1853年编著了《平安通书》,每年出1册,一共编译了4册,由长老会的花华圣经书房出版。其主要内容为天文、地理、气象常识等,具体的如地球知识、日月食、四时节气、西方历法、海洋潮汛等也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并在书中附有大量图表。

三、花华圣经书房及其西学译著对晚清翻译的贡献

花华圣经书房对晚清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填补空白、启迪来者

在中国翻译史上,从明末清初的第二次高潮到清末民初的第三次高潮,中间整整沉寂了数百年,期间中国的西学翻译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19世纪初叶,来华的英美传教士从南至北在中国大地刮起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劲风,他们率先在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来临之前,成立了以译介西学为目的的翻译出版机构,这些机构为传教士的西学翻译在中国的繁荣昌盛,该世纪末本土翻译事业的崛起与随后本土翻译机构的纷纷涌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不可不说美国传教士在华的翻译出版机构的先行者——花华圣经书房填补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空白,而且也为美国翻译史增添了异域翻译的色彩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如上所述,从数量上看,花华圣经书房从创办伊始到最后演变成在大上海颇有影响的翻译出版机构一共编译出版了门类繁杂、文理兼收并蓄的106种书籍,这一数量在整个外来传教士于晚清“40年中,共出各种西书555种”^[4]的数量中也显得蔚为壮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晚清民族翻译事业尚处于一片空白的荒芜时期,这一翻译出版机构所编译的西学书籍堪称近代中国翻译宝库中一笔弥足珍贵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财富。

花华圣经书房不仅填补了19世纪初叶几十年中中国本土翻译出版机构的缺位,而且也为后来的本土翻译出版机构树立了楷模。从表面上看,相隔数十年的传教士翻译机构与中华民族的翻译机构似乎井水不犯河水,风马牛不相及,可实质上,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花华圣经书房几经变迁,在中国存续的数十年中为西学的广泛传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外来文化的轨迹,它不但成为致力于西学传播的晚清外来传教士可以效仿的对象,并且在从事西学翻译的发展过程中,吸纳了不少本土有识之士参与西译中述的翻译工作,这些本土人士日后理所当然成为独立的本土翻译出版机构的中坚力量,成为晚清中华民族翻译出版业的大梁,也将传教士原有的翻译出版模式融入民族翻译出版机构,为民族翻译事业的崛起注入了勃勃的生机。换一句话说,要是没有类似花华圣经书房这样一批外来传教士的翻译出版机构在中国旷日持久的存在,晚清中国民族翻译事业何时能迎来它的

艳阳天绝对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未知数。

(二) 传播西学、唤起东学

在早期通商的五个口岸中,宁波是美国传教士的教育和出版活动较集中的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宁波教会影响最大的活动是花华圣经书房的出版活动。”^{[1]306} 这里,与其说花华圣经书房翻译出版的影响最大,倒不如说它所编译的西学对早期中国的知识界的影响深入人心,大大唤醒了近代中国热切渴求西学的沿海一带嗷嗷待哺的东学。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大量引用过花华圣经书房编译出版的著作中的资料,其中主要有《地球图说》、《平安通书》和《天文问答》等。花华圣经书房的这几部代表作之所以会引起中国士大夫异乎寻常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在传播最先进的西学的同时,不忘以中西对比的眼光来针砭落后中国的凄凉世态。例如,在《地球图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美国的评论:“国内多书院,凡民无论男女贫富,皆准入学,以故译读之人较他国为多。又有印书局几处,每日所印新闻纸均得数千张,而书籍亦印出不少。”^{[3] 29} 这寥寥数语足以透露出:韦理哲的用意在于通过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比较,批评清朝禁止女子入学及新闻事业不发达之状况。

与合信的《天文略论》一样,《天文问答》是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来华传教士通过花华圣经书房最早向国人译介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其内容涉及宇宙结构学说、万有引力理论、日月蚀的原因、风雨的由来等,这些学问非但对知识界,并且对社会的其他领域包括中国现代化都有启迪的意义。

综上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美国传教士就在南洋、澳门和五个通商口岸向中国知识分子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欧美国家的介绍为中国知识分子勾画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美国传教士传播的这些新知识一旦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以天朝上国而是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念来看待和观察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各国,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其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和科学知识的增加和眼界的开阔,而在于承认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文明形式的存在。事实上,徐继畲等人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体现出一种朦胧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而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萌芽正是中国摆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标记。

参考文献:

- [1]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2] Gilbert McIntosh.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13-20.
- [3] 韦理哲. 地球说略[M]. 宁波:宁波花华圣经书房,1856.
- [4]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1.

[作者简介] 高黎平(1958-),男,山西垣曲人,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传教士与晚清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梁复明)